

序言

近年來興起嶺南文化研究的熱潮。按照《嶺南文化百科全書》的界定，嶺南「指中國五嶺以南的地區。……以其地北依五嶺，南臨南海，故名。歷史上含今廣東、海南全部，廣西大部 and 越南北部。有時也泛指兩廣等地。……五嶺是一條重要人文地理分界線，其南屬於嶺南文化區，其北為湖湘文化區和西江文化區。」¹與海為鄰、偏居一隅，和中原地區相隔五嶺的廣東地區，既與中原文化一脈相連，又具有開放兼容、商業化、務實等地方特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嶺南文化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23年11月23至25日圓滿舉行。是次研討會為香港研究資助局協作研究基金撥款項目「嶺南文化與世界：廣東文人文化景觀的建構及轉變(1821-1949)」(2023-2026)的成果之一，此項目由黎志添教授主持，並與七位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其他院校的跨學科學者合作。其旨在具突破性地展現一群極其重要的廣東文人，探索他們如何吸取西方的知識文化並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為在全球語境下理解多元的嶺南文化提供嶄新的研究角度。本項目的重要貢獻是建立一個數位資料庫，在晚清民國(1821-1949)這一近代中國大變革時期

中，選取150位關鍵的廣東文人紳商，由他們的生平經歷考察嶺南文化的發展及變遷。

本協作研究項目試圖打破「嶺南文化作為一個固定對象」的慣性視角，轉而研究嶺南文化不斷在地化的文化再生過程。嶺南文化不僅是具有嶺南地區特色的歷史文化體系，更蘊含著多元而豐富的內涵。移民文化與地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及海洋文化與內陸文化交融的個性又形成了地域色彩濃郁的嶺南文化。

「嶺南文人」概念，不僅指廣東地區的傳統士大夫，還包括香港、澳門等鄰近粵語地區及海外粵語移民社區的藝術、文學、語言、音樂、宗教、教育、物質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不同人物。嶺南作為中華傳統和西方及世界其他文化活躍地區輸入文化的交匯點，這些人物均彰顯其在本土和世界文化史、知識史中的獨特作用。

2023年研討會共邀請了28位來自不同地區院校的學者，包括香港、中國內地、臺灣、新加坡、澳洲及美國，設九個學術專題環節，以發表研究報告並展開討論。專題薈萃人文學科各類主題，涵蓋嶺南文學、跨語言實踐、粵劇、語言學、宗教傳統、科學知識、物質文化，並延伸至教育與文化機構等領域。

《嶺南文化與世界》全書篩選了研討會中的13篇中文文章，²以五個主題串聯：

- (1) 嶺南知識傳播與世界
- (2) 嶺南思想源流與世界
- (3) 嶺南詩文與世界
- (4) 嶺南文化藝術與世界
- (5) 嶺南學術與世界

此五個主題宏觀地展示嶺南文化的精髓及其對香港文化的重要意義，亦探討嶺南文化在歷史中的構建過程，從而強調並分析其多元性及獨特性。本書聚焦於廣東文化走向興盛的清代和民國時期，並以代表及提升地區文化的主體——文人士紳為研究對象。收錄的

13篇文章，有助於探討這一群極其重要的廣東文人在傳統學術發展與接受外來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對推動與深化廣東文化研究起到積極作用。通過不同學科領域專家的對話交流，《嶺南文化與世界》旨在厚植嶺南文化研究的根基，推廣嶺南文化的價值，並促進更多相關研究的持續深化。

中山大學吳義雄〈在嶺南建構中國史：十九世紀前期來華西人的中國史觀〉討論五口通商前的廣州貿易時代來華西人如何及為何重新建構中國史。中國古史的年代學系統與西人基督教史觀不同。十七世紀以來，西方主要有協調、質疑兩種回應。十九世紀前期西人關於上古史觀念的討論，主要生發於嶺南地區，且質疑觀點佔上風。文章論證原因在於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和英語國家學者取代天主教傳教士，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他們尋求顛覆「中國熱」時代的中國觀，推翻以往以天主教傳教士為主體建立的知識體系，對中國社會、文化展開全面批評，塑造與以往不同的中國形象。另一原因則是他們在嶺南的事業和生活經驗讓其相信，包括文化觀念在內的中西關係必須進行全方位的顛覆性變革。

香港浸會大學黃文江〈嶺南大學的漢學：陳受頤與其學術研究〉此文回應了弔詭的問題，即傳播西學為主的教會大學為何在漢學領域成就非凡，基督教知識份子為何願意著力於漢學研究。文章以陳受頤這位學於嶺南、教於嶺南的基督教知識份子兼漢學學者為切入點，運用個人文書、檔案史料及出版物補全歷史、重構陳氏生平，關注他的學術思想及時代意義，探討其文化身份認同，並論述「嶺南因素」在其教、學生涯中起到的重要影響，從而並論說嶺南大學這一教會大學的漢學教研工作的歷史意義。

嶺南地區在普新知、改舊俗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廣州為基地的革命派報刊貢獻尤為顯著。香港教育大學李婉薇〈清末廣東的文人和商人如何合作傳播新知：略論《時事畫報》中梁培基的補腦丸和發冷丸廣告〉以廣東第一份石印畫報《時事畫報》為例，揭示了畫

家與藥商之間的合作關係。該文介紹了《時事畫報》的創辦者——畫家潘達微，以及對報紙創辦至關重要的醫者梁培基，並闡述了該報獨特的廣告制度——畫家為廣告免費繪畫。文章特別從書面粵語與圖像這些獨特媒介出發，分析了廣告這一對報紙運營極為重要之部分的宣傳策略，並探討嶺南社會和文化如何直接參與中國現代性的建立。

香港中文大學黎志添〈《酥醪九老圖》與羅浮山道教酥醪觀：入世與出世〉考證一張〈九老圖〉合照，結合人物位次安排及裝束得出結論：他們並非「羊城九老」，而是同為羅浮山酥醪觀全真龍門派第十八傳「永」字輩的同門弟子，此合照應正名為〈酥醪九老圖〉。該文另鋪陳考證此圖之外的七位「永」字輩弟子的生平及他們入道酥醪觀的經歷，以及合照背後隱藏的羅浮山酥醪觀自清代以來的歷史變遷。黎教授指出在清代遺民地景之中，建構廣東地域文化的共同身份並非全部，還應關注宗教群體關係及群體內部的身份認同。

香港中文大學嚴志雄〈晚清越南、嶺南文士所舉之「中外群英會」及其文化意義〉觀察到了晚清時期嶺南與越南文士交流的文化現象，並以文人繆艮（1766–1835）及其與越南入華使者在廣州珠江所舉辦的雅集「中外群英會」為案例，深入分析了這次特殊的文化生產活動。「中外群英會」之發端並非尋常的使節往來，而是因為颱風與盜賊等特殊事件。作為中越文士詩文聚會，其與尋常的外國使節詩文、遊記不同，體現出嶺南與越南之間在地緣、人種、歷史與文化上的深厚淵源。

新加坡國立大學林立〈葉落歸根：清朝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的嶺南詩〉將視野聚焦到海外華人的文學作品上，文章以清朝駐新加坡的首任領事左秉隆（1850–1924）為案例，探討並分析了其作品，尤其是《勤勉堂詩鈔》字裡行間所流露出的漂泊感與離散意識。左秉隆作為嶺南晚近優秀的詩人與外交官，不僅在任上關心華僑文教福祉，同

時亦對故鄉家國懷有深深的情感，令人尊敬。透過其詩作，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嶺南文人的海外故事與風雅。

香港中文大學蔡志祥〈文化認同與國族認同：以1956年越南堤岸廣肇幫萬人緣建醮為中心〉通過細緻解讀越南堤岸1956年的廣肇幫萬人緣醮會及《堤岸廣肇幫萬人緣醮會徵信錄》這一文本，分析越南堤岸的廣肇幫華人是如何在萬人緣醮會這一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帶廣府人社區所「創造」的度亡救贖儀式中建立「特殊他者」的身份，以應對在異鄉的國族危機。

南開大學黃相輔〈從讀者到出版家：王雲五與商務印書館的科學傳播事業〉以王雲五入館前的閱讀及社會經歷為經緯，探討王雲五如何從普通讀者成為著名出版家。文章指出，雖然王氏生於上海，但他的廣東人身份認同及家族所帶的、與內地文化截然不同的「嶺南文化」對他影響深遠。此文分析了1920年代商務印書館編譯發行方向變化背後的社會文化脈絡，以及讀者、作者、編輯與出版者間的人際關係網絡。同時，文章引導讀者關注王氏的個人能動性、自學經歷，以及受「嶺南文化」影響而形成的普及教育理念和推廣西方新學的思想，強調我們不應將王雲五僅視為胡適的代言人。

香港城市大學陳學然〈胡素貞的文教事業與香港社會發展：以道德重整運動為中心〉展示了「道德重整運動」這一世界性靈性運動如何在嶺南一隅——香港展開。文章梳理香港傳統名校聖保羅女書院初創時期的校長、教育家胡素貞的文教事業，以及其與香港社會發展的緊密聯繫，探討兩者如何相互促進。同時呈現了香港社會不同階層、背景的人物與事件，及其與胡氏交織的世界網絡。

香港中文大學程中山〈中原北望知同慨，吾道南來幸不孤：1950年代香港海角鐘聲雅集研究〉主要考察了1945年抗日勝利後的1950年代的香港文壇。在這一時局動蕩的歷史時期，香港文壇正處於復興重振的進程。是時，一批原國府軍政人員滯港，常集會寫作，以

詩言志，其中一典型案例即熊式輝（1893–1974）組織的「海角鐘聲」雅集，會同文友敘寫流亡海角與家國興亡之情懷。此外，《海角鐘聲第一集》、《海角鐘聲第二集》更為香港文壇留下了珍貴的文學遺產，彰顯了戰後時期南來文人的文學旨趣。

香港中文大學周穎菁〈全體動員的海后號：從首艘入華的法國商船看清代中法貿易的運作〉以法國商船海后號為案例，回顧了清代中法貿易之間微妙、複雜的歷史處境。法國商船海后號於1698年初訪廣州，作為一艘歐洲商船，其性質複雜，不僅肩負著商貿、調查中國沿海風土的任務，同時也有其外交目的，即為中法宮廷建立特殊的外交關係，這也是法國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渴望達成的目標。透過海后號訪華的個案，可以看到當時中法之間的商貿活動往往牽涉多個群體，包括了法國宮廷、清宮、耶穌會士、商人等，這也造就了中法貿易間微妙的官商合作關係。

香港中文大學陳文妍〈民國嶺南學人對金石學與考古學的探索：以蔡守、胡肇椿、鄭師許為例〉考察了晚清民國之際嶺南地區金石學與考古學的發展脈絡，並以蔡守、胡肇椿、鄭師許這三位關注金石與考古的嶺南文人學者為例，回顧他們的生平與學術活動及論著，一窺他們在這新舊交替、中西碰撞的歷史時期，對中國傳統金石學與外洋考古學的研究歷程之不同進路。

香港中文大學卜永堅〈鄒伯奇與對數〉，以廣府文人鄒伯奇（1819–1869）及其對「對數」（logarithm）的研究為個案，探討了這種知識進入中國後的流轉過程。鄒伯奇在諸多科學領域均有建樹，諸如光學、力學、測繪學等，作者於是文不僅論證鄒氏於中國科學史，尤其是在數學史上的地位，而且展示出知識傳播的中介、網絡、本土化等複雜過程，特別是嶺南學術與中國其他地區乃至海外學術體系的交流歷程。

透過以上概述，本書議題之廣泛深入，讀者當可窺見一斑。本書的主要特點是讓嶺南文化景觀突破單一學科桎梏，超脫地方/全

球、東方/西方的簡單二元對立；挑戰主流話語對嶺南文化傳統—現代線性發展的描摹，充分展現了該時期嶺南文化的複雜多元和豐富內涵。我們期待本書的出版，能激勵更多學者共襄盛舉，進一步發掘和探索嶺南文化的深厚寶藏。最後，本人特別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對「嶺南文化與世界」跨學科協作計劃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 C4006-22GF) 的資助，為該計劃進一步跨地區的分析 and 比較，提供十分有價值的研究方向與合作機會。本書的出版亦是協作計劃的研究成果之一。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2026年1月18日

注釋

- 1 左鵬軍主編：《嶺南學·第2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0。
- 2 2023年研討會有兩篇英文論文已刊載於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0期(2025年1月)，分別為 Don Snow, “Lingnan Literati and Cantonese Love Songs” 以及 Michelle Jia Ye, “Bilingual Sources of Kwong Ki Chiu’s English-Chinese Lexicons, 1868–1887.”